

從一件青瓷五管瓶談起

施靜菲

前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

收藏有一件青瓷五管瓶（圖一），這件造型

奇特的瓶，與我們一般常

見的瓶、壺不同，肩上立有五

管，並以蓮花為裝飾主軸。全器

通高約三十公分左右，器蓋整個

像一朵蓮花，蓋身為四出花瓣，

外緣往上揚，每瓣中有一小孔；

蓋紐為一花蕾，下飾有花托。短

直頸，肩上置有五個荷莖狀圓

管，管與身不通，器身由上往下

呈五層塔狀，最大腹徑在第四

層，增添了幾分穩定感。裝飾隨

器形之分段也分為五層，由上往

下一到三層皆為斜刀刻直線紋，

第四層為弧線紋，類似菊瓣；最

下一層分布數層的仰蓮瓣紋，在



較粗的

輪廓線內劃有直篋線紋。胎為灰

白色，而圈足外沿露胎處呈深褐

色。釉色青綠，積釉處釉層凝厚

且氣泡多，釉薄處晶亮透明，但

有些部位如器蓋蓋沿外翻處，釉

較薄且有土咬的痕跡，故呈淡黃

偏白之顏色。

與此瓶造型相似，即肩前置

五管，裝飾以蓮花為主的這類五

瓶（或稱
管

多管瓶），在許

多論及宋代浙江青瓷的著作，

經常提及，到底這一些造型特別

的五管瓶功能為何？流行於什麼

時代及哪些地區？其造型來源及

演變又如何？本文將藉由對此類

五管瓶的整理分析，讓大家認識

本院收藏的這件青瓷五管瓶，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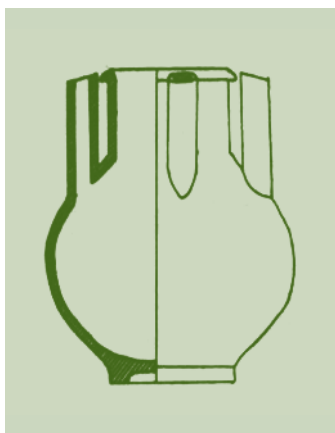
一方面提出相關問題，希望為往

後研究提供一些可能的方向。

圖一 北宋龍泉窯青瓷五管瓶
通高28公分、口徑6.3公分、底徑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景德鎮湖田窯出土北宋六管瓶
（《景德鎮出土陶瓷》，圖24）



圖二 山東棗莊出土多管瓶（《中國古代
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頁379，圖六-5）

一、青瓷五管瓶的分布區域

在這裡有必要先將此類五管瓶和同時期其他也帶有多管的瓶、壺作一區分。例如北方磁州窯系和山東棗莊地區瓷窯所燒製之多管瓶（圖二），管的數目不一，有六管也有五管的，瓶身較短，圓腹，肩部置有直立的管，這種造形與故宮所藏青瓷五管瓶

相差甚遠，且少有裝飾。在江西景德

鎮窯址也發現有多管瓶（圖三），口

沿下的覆蓮瓣裝飾與腹部刻劃花，對

照之下，似乎與故宮所藏青瓷五管瓶

有些淵源，但其圓筒腹與粗直的圓管

和浙江地區的青瓷五管瓶不盡相同，

且瓶口處鏤空七孔，學者推測可能是

花器（謝明良，一九九九）。在未有進一步

的補充資料之前，我們先將討論範圍

限定在與故宮所藏青瓷五管瓶相關的

宋代浙江青瓷五管瓶作品。

因為五管為最常見的形制，所以

我們將此類作品統稱為五管瓶，根據

當地學者指出，目前發現的同類作品

中，有四管、五管、六管、七管、十

管甚至十五管的，數目不一定，但以

五管最常見（朱伯謙，一九九八）。歸納此

類五管瓶的主要特徵在於：

（一） 肩上附有五管或多管

（二） 附有器蓋（有些可能遺

失），蓋紐多為蓮蕾

（三） 器身有多層塔腹形（參

見圖一），或類似梅瓶腹

之不分層形式（圖四A）

（註一）

（四） 多以蓮花來裝飾

（五） 都是青瓷產品，未見有其

他釉色的同類作品。

故宮所藏的這件青瓷五管瓶，即為很典型的作品（參見圖一）。

將此類青瓷五管瓶作品視為浙江

地區的特有產品應該沒有太大的疑

問，但是浙江地區有那些窯口燒製五

管瓶呢？越窯、龍泉窯等窯系都包含

廣大的區域，擁有複數以上的窯場，

除非能夠充分掌握浙江地區各個窯場

作品的特徵，否則只能以皆同屬於浙

江地區的作品來看待，而無法強去細

分它們的窯屬。過去最受爭議的是收

藏在日本大和文華館的一件帶有「元

豐三年……」銘的青瓷五管瓶與收藏

於英國大衛德基金會同樣帶有「元豐

三年……」銘文的長頸瓶（圖五），其

窯屬會有不同之說法，此兩件作品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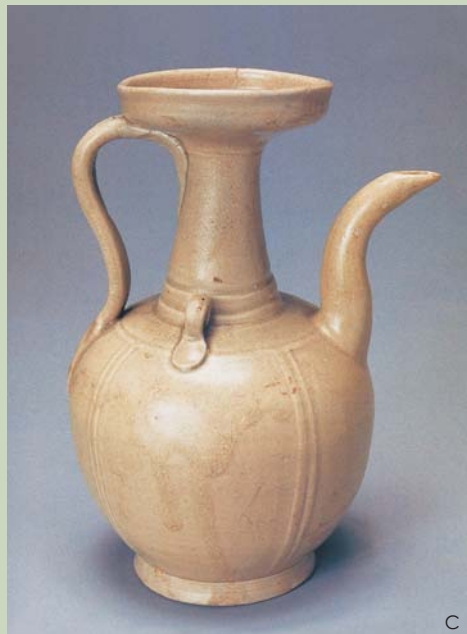
經過日本學者龜井明德的仔細鑑別，

認為應該為龍泉窯作品的可能性較高

（龜井明德，一九九二）。關於上述此件五

管瓶作品，從具體風格看來，其裝飾

圖四 浙江龍泉市茶豐縣墩頭村土洞墓出土A五管瓶 高三九·五公分、B長頸瓶 高四〇·一公分、C執壺 高一七·五公分（龍泉博物館藏）（《龍泉窯青瓷》，圖二六、圖二七、圖二八）



的蓮瓣與龍泉大窯早期的作品一致（朱伯謙，一九八九b），佈局也很相似，故筆者亦同意龔井將之定為龍泉窯的看法。而故宮所藏的青瓷五管瓶（參見圖一），從各方面來看也應屬於龍泉地區窯口生產的作品，包括灰色胎質、青綠色釉，斜刀深刻的線紋，蓮瓣刻劃以粗輪廓線框圍直篋線紋等等，皆為龍泉窯北宋中期作品的特點。

朱伯謙在〈龍泉青瓷簡史〉一文中曾經提到：「這種瓶，

有人誤認為越州窯的產品，其實，在越窯和甌窯中都不見，是龍泉窯特有的一種產品」。（朱伯謙，一九八九a）在其一九九八年為《龍泉窯青瓷》圖錄所寫的文章當中，再次肯定原來的看



圖五 「元豐三年」銘（1080年）A青瓷五管瓶，高27公分，日本大和文華館藏；B青瓷長頸瓶，通高37.6公分，大衛德基金會藏。《《陶磁大系》三六，青磁，插圖29、28）

法，並歸納當地文物考古工作的情況指出，僅浙江南部龍泉縣金村、大窯、慶元縣上垟等地窯窯生產此類五管瓶，從六十年代至今，對餘姚、慈溪、寧波、鄞縣、上虞、紹興等地越窯窯址和溫州、永嘉、瑞安等地唐宋

甌窯窯址的多次調查和發掘，都沒有發現多管瓶的破片；出土情況也類似，多管瓶在龍泉縣和慶元縣出土最多，其他地區極少見（朱伯謙，一九九〇）。顯然這類型的青瓷五管瓶具有強烈的地區性格，集中在浙江南部龍泉與慶元附近地區。

雖然如此，但是我們發現，有一些作品並非典型龍泉窯風格，而是具有五代北宋的越窯系風格，例如收藏於日本的一件多層式五管瓶（圖六），從器上蓮瓣的浮雕式刻劃、器蓋上的細線刻花，以及往外撇的高圈足，都具有五代北宋初期的越窯系作品的特色。（註二）也有學者認為這類作品薄胎、



圖六 北宋早期青瓷五管瓶，通高三三·一八公分。《世界陶磁全集》（二一，圖四四）

淡青釉刻花線條纖細及底部用墊環支撐的特徵（參見圖四），明顯受到唐宋時期甌窯的影響，但是五管瓶的器形僅見於龍泉地區瓷窯（朱伯謙，一九九〇）。由於筆者目前未能親見實物做進一步判斷，如果我們尊重當地瓷窯考古學者的看法，五管瓶只產於浙江南部龍泉金村、大窯、慶元縣上垟等地瓷窯，但是對於那些帶有越窯系風格的北宋早期作品，應該被稱為龍泉窯，或是龍泉及慶元地區瓷窯涵蓋在越窯窯系，甚至是唐宋甌窯窯系下時期所生產的作品，則必須視我們對窯系的定義來決定，這個部分

已超越本文的範圍，有待

往後有

進一步的討論來釐清。（註三）

二、造型的變遷與流行的時代

關於五管瓶的造型演變，筆者將由形式發展趨勢配合出土的紀年資料來展開。現在筆者先將兩種形式的五管瓶分開，分別看其發展（附表）：

（一）A型：多層塔腹形

早期：（十世紀末到十一世紀中）

以（A-1）作為北宋初期的代表，是為較早的形式，這些作品都有強烈的北宋早期越窯系風格，例如浮雕式蓮瓣、細線刻花以及外撇的高圈足等特點。

中期：（十一世紀中到十一世紀末）

以龍泉博物館藏「庚戌」年款（推測一〇七〇年）（A-2）和日本大和文華館「元豐二年」銘（一〇八〇）之五管瓶（A-3）為代表，另外英國巴洛家族收藏（Barlow Collection）的蓮瓣紋五管瓶（A-3）、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之寶相花紋五



圖七 浙江武義出土黑褐釉多級盤龍罐，通高33公分。《《文物》》，1984-8，圖8)

管瓶 (A-4) 與院藏的青瓷五管瓶 (A-5)，都可看成是中期的作品。此期作品的器身上部各層比例相當，最下一層較長，這樣的形式還可見浙江武義縣北宋元豐六年 (一〇八二) 墓出土的黑褐釉多級蟠龍罐 (圖七)，雖然此罐與五管瓶為不同類的器形，但從其所表現的形式來看，器身多層塔形的表現，且器身上部各層比例相當等特徵，兩者相當一致，因此可視為時代相近的產物。另外，中期作品不只器身的比例改變，五管的直削稜狀漸漸轉變至較渾圓，不再稜角分明，且口沿成鋸齒狀的花口。

晚期：(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中)

以英國巴洛家族收藏的蓮瓣紋五管瓶 (A-7)、慶元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收藏的蓮瓣紋五管瓶 (A-8) 與龍泉博物館收藏的帶銘五管瓶 (A-9) 為代表，器身各分層的比例趨向於平均，五管還可見花口的圓管狀，或甚至變成了圓直的管，不過管上仍留有一些直削稜線的痕跡，例如 (A-7)。至於將此三件作品定為晚期的原因，是以五管瓶上的裝飾配合參考龍泉窯的編年來看 (任世龍，一九八四：亀井明德，一九九一；Kaneh Melioku, 1994)，原本中期盛行刻直線紋和菊瓣紋裝飾，到了晚期，除了斜直線紋外，大多以蓮瓣紋及簡潔的雲氣紋為主。

(二) B型：梅瓶形腹

早期：(十世紀末到十一世紀中)

時代與A型的早期相當，可以 (B-1) 到 (B-3) 作為代表，(B-1) 蓋上與 (B-3) 器身的

浮雕式蓮瓣，都具有十世紀末

到十一世紀初北宋早期風格；(B-2) 的蓮瓣雙線輪廓裝飾手法，與上海博物館藏帶有「太平戊寅」銘 (九七八) 的長頸瓶，有類似的時代風格 (朱伯謙，一九八〇)。

中期：(十一世紀中到十一世紀末)

龍泉縣三溪古墓出土的一件五管瓶 (B-4)，依照器身肩部的弧度、波浪堆紋裝飾及五管呈花口圓管狀，都可看出是比茶豐墩頭村出土五管瓶約為同時期但稍晚的作品。

晚期：(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中)

根據前面對龍泉窯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中的風格分析來看，(B-5) 的斜直線紋及腹部較鬆散的纏枝蓮裝飾，可將其視為此時期的作品。

我們從附表中A型、B型的發展演變分期來看，可看出A型、B型是有重合存在的時期，只是B型到中、晚期就少見了，而A型較為流行。又



圖八 南宋龍泉窯青瓷五管瓶，高12.4公分、面徑13公分、足徑7.2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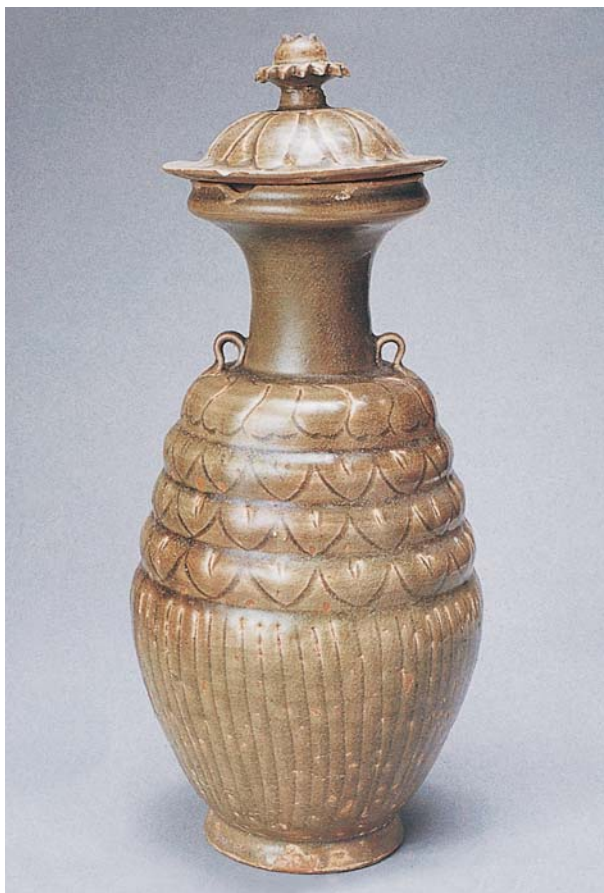
到了南宋以後，基本上就很少再見到這類型的五管瓶了，可見此類五管瓶也具有濃厚的時代特徵。（註四）

本院藏有一件南宋龍泉窯翠青五管瓶（圖八），造型與北宋的浙江五管瓶不太一樣，口很小，五個圓管筆

直向上，器身矮胖，全器僅高十二·四公分，與北宋五管瓶一般三十公分左右的高度相差甚遠。（註五）兩者之間是否有承繼關係，下文中再進一步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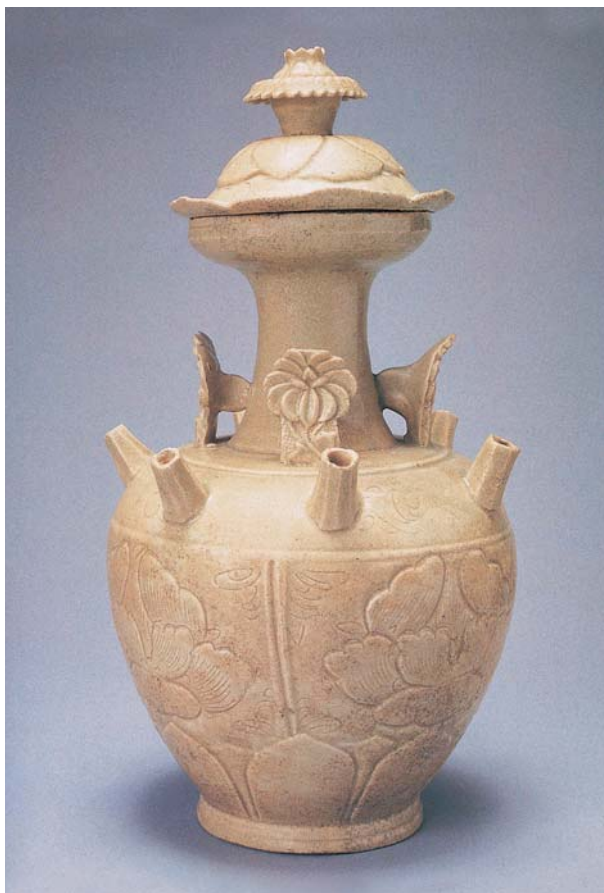
三、其他相關類型作品

從很多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五管瓶經常與長頸瓶成對出現，例如前面提到日本大和文華館所藏「元豐三年」銘之五管瓶與英國大衛德基金會收藏的長頸瓶（參見圖五），龜井明德曾對這兩件帶有「元豐三年」銘的作品做了詳細的考證，從銘文入手，以證實此二件青瓷作品是同一座墓的隨葬品。（註六）而當我們看到龍泉博物館收藏的多層塔腹形長頸瓶（圖九）與慶元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收藏的長頸多管瓶時（圖十），不禁要懷疑，這兩件造型奇特的瓶是否就是長頸瓶與五管瓶的混合體。又（圖十一）之多嘴長頸瓶，在器腹上置五個有孔的小嘴，這種形式也是少見，其器形與頸之間所置的葉片，與前述的多管長



圖九 北宋青瓷多級長頸瓶，通高三七公分。
龍泉博物館藏（《龍泉窯青瓷》，圖五五）

頸瓶，似乎也相通。而此時再將其連繫到（圖十二）之多嘴瓶，兩者所飾的小嘴形狀幾乎相同，且此多嘴瓶的器身也作多層塔腹形，器蓋也以蓮花裝飾，可見這種多嘴瓶與五管瓶關係密切。（註七）日本學者長谷部樂爾曾將多角瓶、多嘴瓶及五管瓶都視為同一類作品，並推測這些奇異造型的瓶壺應有某一種宗教之用途（長谷部樂爾，一九七二）。矢部良明也曾經指出多層



圖十 北宋龍泉窯青瓷多管瓶，通高三三·五公分
慶元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藏（《龍泉窯青瓷》，圖四二）

塔腹型五管瓶與多角瓶有密切關係（矢部良明，一九七八）。

多角瓶、多嘴瓶在中國南方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像浙江、湖南、福建、四川、廣東、廣西等地。在浙江地區這類多角瓶的時代可以早到晚唐五代（賈昌，一九八二），湖南、四川、廣東、廣西等地唐宋時墓葬也很常見，例如湖南長沙晚唐五代墓出土的多角瓶（圖一三），器身呈多層塔形，每

一層各置有四角。像這樣的角狀物，與浙江早期五管瓶的「管」很接近（參見圖六），連彎曲的角度都很相像；又器身的多層塔形也與之相似，讓人不禁聯想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影響關係。另外在浙江五管瓶主要產地的慶元縣也出土一件晚唐青瓷多嘴瓶（圖一四），肩上所飾的五角與後來的五管應該也有一定的關連。在青瓷五管瓶流行地區，這類多角、多嘴瓶入



圖一三 湖南晚唐五代墓出土的多角瓶
(周世榮, 1987, 圖7-2)

宋以後就很少見到了，青瓷五管瓶與當地這類多嘴、多角瓶是否存在著某種承繼替代關係，也是值得考慮的。

多嘴瓶、多角瓶等也經常與堆塑裝飾結合，最常見的是多角瓶加上蟠龍、蟠虎的形式。而蟠龍、蟠虎貼塑瓶形式的發展更是多種多樣，在江西、湖南、福建、廣東、浙江等地都有這樣形式的出現，不過各個地區的表现不盡相同。例如江西地區的日月瓶（圖一六），堆塑人物、走獸等等，而且通常出現一龍一虎成對的裝飾。（註八）前述浙江武義縣出土的黑褐釉多角瓶及湖南湘鄉桃林水庫出土的多角罐（圖一五）（周世榮，一九八七）也有堆塑蟠龍的裝飾；另外像南宋龍泉窯作品常見蟠龍堆塑瓶（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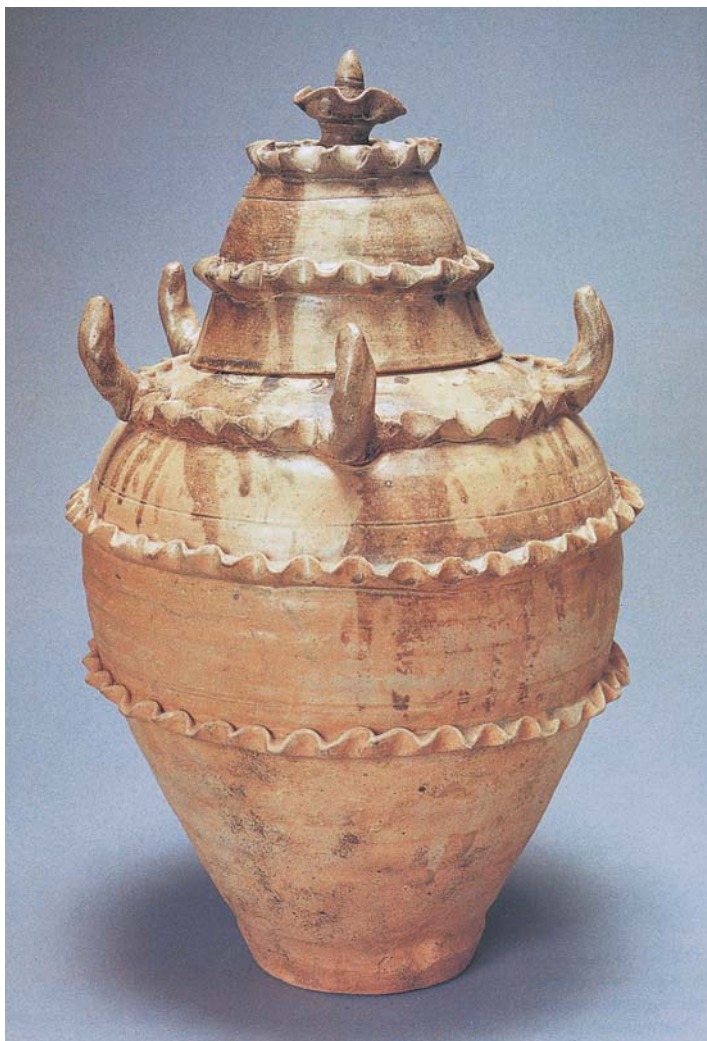


圖一二 北宋青瓷多嘴瓶，通高25公分。
(《世界陶磁全集》10, 河出書房, 圖22)

圖一一 北宋青瓷多嘴長頸瓶，通高30公分。
(《世界陶磁全集》12, 圖171)



七)，除了肩上飾有蟠龍外，器腹並飾有蓮瓣紋。英國大衛德基金會收藏有成對的南宋龍泉窯蟠龍、蟠虎瓶（Rosemary E. Scott, 1989, pl. 44）。更巧的是在浙江遂昌縣出土的一件作品上（圖一八），我們看到五管瓶加上蟠



圖一四 晚唐青瓷多角瓶，高四二·八公分、口徑一〇公分、底徑九·五公分。慶元文物管理委員會藏（《龍泉窯青瓷》，圖一七）

龍堆塑。從五管瓶在南宋之後就漸漸減少的情況來看，龍泉地區的五管瓶和蟠龍、蟠虎瓶的關係也就更耐人尋味了。浙江方面的學者即認為，「此堆塑蟠龍五管瓶為龍泉窯中龍虎瓶由多管瓶發展而來的實物

例證，以後多管瓶不見了，只生產龍虎瓶」（《龍泉窯青瓷》，頁一三三）。

由以上之論述來看，浙江地區的五管瓶、多角瓶、蟠龍瓶都有一定的關係，而且筆者認為它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只是形式上的影響，混融而已，應該還隱含了實質意義上的相通或關連。

四、五管瓶的可能用途

五管瓶多出於墓葬，而且五管瓶的管與器身多不通，無法實際使用（朱伯謙，一九九八），所以這一類東西是陪葬用的明器應該是沒有太大的疑問。從這個角度來看，前述院藏南宋龍泉窯翠青釉五管瓶那類的作品（參見圖九），多出於窖藏和沉船之



圖一五 湖南湘鄉桃林水庫出土多角堆塑罐，通高40公分。（周世榮，1987，圖9-1）



圖一六 江西新建縣景定四年（一一六三）墓出土日月瓶，通高八九公分。江西省博物館藏（《中國古陶瓷》，圖一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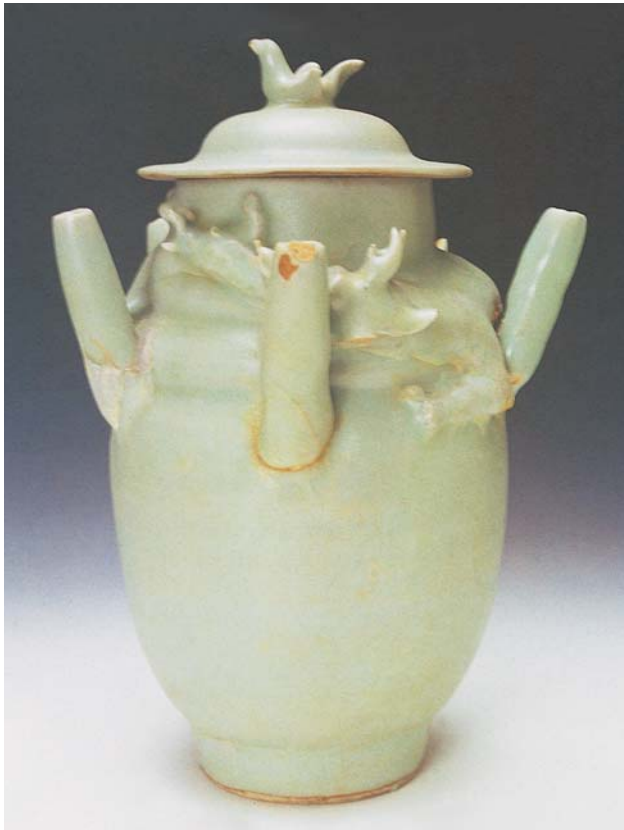
中，作為生活用器的可能性較高（蔡汝芬，一九九九），與本文所討論的五管瓶，不僅器形相異，功能應該也不同。至於五管瓶在墓葬明器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確切的作用究竟為何呢？對於這個問題，過去學者們有許多推測，最常被提到的是「穀倉」

說。（註九）龜井明德在對「元豐三年」銘五管瓶及長頸瓶的研究中，從銘文連繫到浙江地區六朝時期的青瓷穀倉罐及唐代出土甚多的糧罌瓶，論證五管瓶作為儲藏食物的用途（龜井明德，一九九三）。而在後來出土的一青瓷五管瓶，蓋內墨書（圖一九）：「張氏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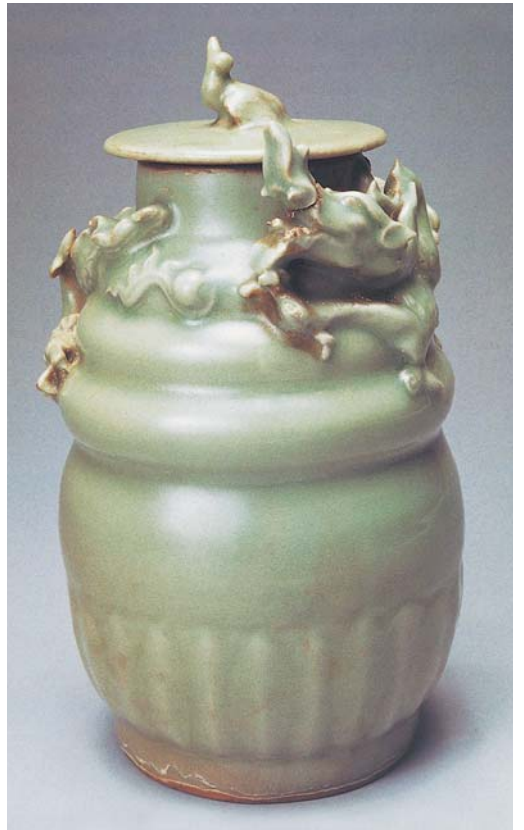
娘五谷倉櫃上應天宮下應地中蔭子益孫長命富貴」，即直接點出這類器物作為五穀倉的用途，而且可庇蔭子孫。（註十）

其他形式如前述流行其他地區之多角瓶、堆塑蟠龍瓶也具有同樣的功能，像福建宋墓出土的多角瓶，內盛裝稻穀，更加證明多角瓶作為「穀倉」的用途（曹凡，一九五八）。江西的日月瓶也曾發現有盛裝稻穀，或是自銘倉庫的例子。（註二）而在湖南出土的一件堆塑蟠龍瓶，下腹部刻著「倉廩實」三字（周世榮，一九八七）。它們作為陪葬用的穀倉亦無庸置疑。

學者對六朝穀倉罐的考察（圖二〇），推測墓葬中的穀物倉庫，應該不僅是穀物儲藏之地，同時還是死者亡魂憑居之處，且具有祈求子孫繁衍、六畜繁殖或穀物豐登的功能（小南一郎，一九八九；謝明良，一九九二）。這在我們前述青瓷五管瓶蓋內墨書（參見圖十九）簡短的話語中，也清楚道出這樣的用途。我們先前提到龜井明德從「元豐三年」銘五管瓶及長頸瓶的銘



圖一八 南宋青瓷五管蟠龍瓶，通高24公分，遂昌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龍泉窯青瓷》，圖100）



圖一七 南宋龍泉窯蟠龍堆塑瓶，高23公分，溫州博物館藏。
（《龍泉窯青瓷》，圖105）

文，將它們連繫到浙江地區六朝青瓷穀倉罐及唐代的糧罌瓶，論證五管瓶作為儲藏食物的用途。但是應該注意的是，可能作為六朝穀倉罐前身的東漢五聯罐分布範圍限於浙江地區，而六朝穀倉罐的分布範圍較廣，集中在浙江、江蘇兩地，又福建、江西等地亦有零星出土（謝明良，一九九二）；唐代糧罌瓶大多分布在浙江地區，北宋五管瓶僅限於浙南龍泉與慶元地區，而多角瓶、多嘴瓶、堆塑瓶等相關類型產品在江西、福建、湖南、四

川、廣東與廣西等地區的發展，是不是在此樹枝狀架構下的其他環結？它們彼此之間的影響交流關係為何？目前的研究多為地區性的個別研究，對於中國南方廣大地區的各式穀倉陪葬明器，尙未有較全面的綜合性討論。又五管瓶以蓮花為主要裝飾，和作為其前身的糧罌瓶、穀倉罐也有很大的差別，其風格來源或形式意義，似乎應該有進一步的考證。而「五管」似乎與穀倉罐口沿下的四、五餅有關，甚或與東漢堆塑五聯罐有關，和糧罌瓶在形式上關係不強，其中形式之演變過程，似乎有斷層、重合與接續，又承繼五管瓶的蟠龍、蟠虎瓶，是否受到其他區域，例如浙江武義、江西或福建地區的影響，也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五、結語

由上面所提出的一些檢討與釐清，我們回來看院藏的青瓷五管瓶，這種五管瓶具有濃厚的地區性與時代性特徵，出現的時代多集中

在北宋，為浙江南部龍泉、慶元地區瓷窯特有的產品，多出土於龍泉縣與慶元縣，在裝飾上都以蓮花為主題，從蓋紐、五管到遍佈器身，像一首蓮花交響曲。(註二)經由其風格演變的序列再配合龍泉窯的編年來看，故宮的此件作品大約為十一世紀後半的作品，它不只是儲藏食物的穀倉，且為慰藉亡者靈魂，祈求子孫富貴的陪葬用品。

有趣的是，我們藉此也可看到，浙江地區以穀倉陪葬的喪葬習俗在同時代的演變，以及類似用途的陪葬品，在不同地區的相關表現，像浙江、湖南、福建、四川、廣東、江西等地的多角瓶、多嘴瓶或堆塑蟠龍、蟠虎瓶。這些特製的陪葬品，在表現形式也都各具地方特色，以及相互混融影響，進而在實質的內容意涵上，反應了各個地區的風俗習慣及信仰的

相似及相異之處，其之中的時空交繫關係與來龍去脈，希望未來可見到進一步深入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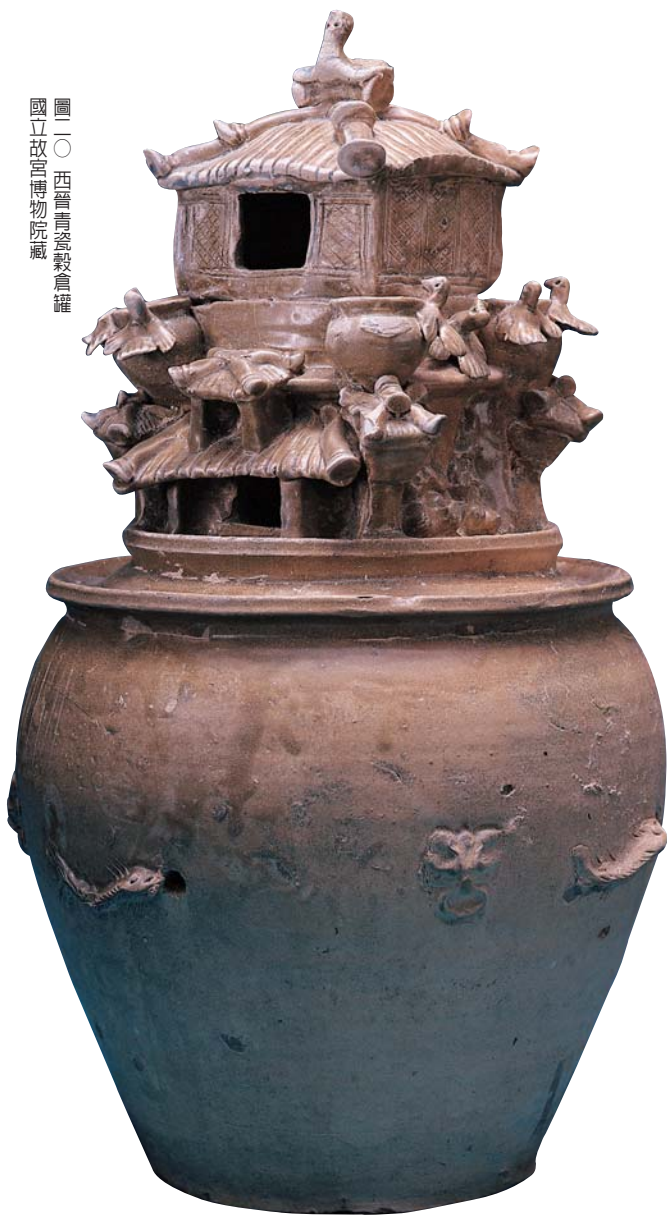
參考書目

小南一郎，〈壺型の宇宙〉，《東方學報》，一九八九，頁一六五—二二一。
 矢部良明，〈宋代青瓷の展開〉，《世界陶磁全集》十一・宋（東京，小學館，一九七八），頁一八一—一八二。
 任世龍，〈龍泉青瓷的類型與分期試論〉，《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二二一。
 朱伯謙，〈龍泉窯〉，《龍泉窯青瓷》（台北，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八），頁六一—九一。

圖一九 北宋龍泉窯青瓷五管瓶，通高三〇公分，龍泉博物館藏。
 《龍泉窯青瓷》，圖五六、《龍泉窯青瓷》，圖六一為其底部。



家出版社，一九九八，頁六一—九一。
 朱伯謙（1989a），〈龍泉青瓷簡史〉，《龍泉青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一一—三七。
 朱伯謙（1989b），〈龍泉大窯古瓷窯遺址發掘報告〉，《龍泉青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三八—六七。
 朱伯謙，〈龍泉窯的起源と早期の製品の特徵〉，《出光美術館館報》，第三九期，一九八一。
 長谷部樂爾，〈褐釉裝飾壺とその周邊〉，《大和文華》，第五十四號（一九七二），頁一八—三三。



圖一〇 西晉青瓷穀倉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周世榮，〈湖南出土盞口瓶、罐形瓶和牛角罐〉，《考古》，一九八七年七月，頁六四八—六五一。
 賈昌，〈談婺州窯〉，《中國古代窯址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三—三一。
 陳定榮，〈堆塑瓶論〉，《江西歷史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月，頁九一—一〇一。
 富田哲雄，〈宋・元の日月壺について〉，《東洋陶磁》，vol.20-21（1990, 91-92），頁一三五—一八六。
 森達也，〈元代龍泉窯的分期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卷第一期（二〇〇二），頁一九—四八。

楊后禮，〈江西出土的堆塑長頸瓶研究〉，《南方文物》，一九九一年，頁八七—九五。
 謝明良，〈六朝穀倉罐綜述〉，《故宮文物月刊》，第一九〇期（一九九九），頁七六—八七。
 謝明良，〈清異錄中的陶瓷史料〉，《故宮文物月刊》，第二〇九期（一九九二），頁四四—六一。
 蔡汝芬，〈南宋龍泉窯青瓷五管瓶〉，《故宮文物月刊》，第二〇〇期（一九九九），頁一一一。
 龜井明德，〈越州窯と龍泉窯—轉換期の青瓷窯〉，《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朝日新聞社，二〇〇二），頁五八—六三。
 龜井明德，〈元豐三年發書磁かめへの諸問題〉—

文，發表於《大和文華》，第九一號，一九九三。
 龜井明德（1992a），〈龍泉窯青磁創燒時期への接近〉，《貿易陶磁研究》，一九九二，第十二期，頁一四—一五七。

龜井明德（1992b），〈草創時期龍泉窯青磁の映像〉，《東洋陶磁》，第十九號，一九九二。
 《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〇）

《中國古陶器研究》（台北，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四）
 《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

《世界陶磁全集》十一・宋（東京，小學館，一九七八）

《世界陶磁全集》十・宋（東京，河出書房新社，一九六一）

《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九八）

《陶磁大系》三六・青磁（東京，平凡社，一九七八）
 《新安海底文物》（漢城，三和出版社，一九七九）

《龍泉窯青瓷》（台北，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八）
 Kanei Meitoku, "Chronology of Longquan Wares of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ed. by Chuimei Ho.

Rose Kerr, *Song Dynasty Ceramics* (London, V&A Publications, 2004)

Sheilagh Vainker, "New Light on zhejiang Green Wares", *Oriental Art*, Vol. XXXIX, No. 2, Summer 1993.

Jan Wirgin, *Sung Ceramic Design* (London, Han-Shan Tang Ltd, 1979)

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Ceramics, Bronzes and*

Jades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Alan and Lady Barlow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註釋

- 一：任世龍在談論龍泉青瓷的分期時，將浙江省龍泉市茶豐鄉墩頭村出土的多管瓶、長頸瓶和執壺（圖四），當成所謂「早期龍泉」的基準作品。在龜井討論龍泉窯的開窯時期時即已作過檢討（龜井明德，一九九一a），他當時以附加堆紋及分隔之瓜棱線作為編年依據，將此三件作品的年代定在十一世紀後半。筆者對於龜井以附加堆紋及分隔之瓜棱線作為編年依據，有所保留，雖然經由風格的比對，也同意茶豐鄉墩頭村出土的長頸瓶（圖四二）與帶有「元豐三年……」銘（一〇八〇年）的長頸瓶（圖五之二）具有同一時代的風格，盤口的形狀，細長的頸部以及近似蛋形的下腹都極為類似，但時代似乎要早一些。龜井後來的著作，在新資料的補充下，亦傾向將這三件作品視為龍泉窯北宋早期的作品（Kamei Meitoku, 1994, pp. 47-49），認為他過去將龍泉窯開窯時期定在北宋中期的看法，有修正的必要（龜井明德，二〇〇二，頁六三）。
- 二：參見蘇州市虎邱建隆二年（九六一）塔基出土青瓷《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一），及《世界陶磁全集》十一·宋，圖四三；的北宋越窯刻花瓶（東京，一九七八）。
- 三：龜井明德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對浙江青瓷窯系發展的研究，作了重要的回顧與展望（龜井明德，二〇〇二）。隨著龍泉地區窯址的發掘進展以及當地學者的研究陸續發表後，許多博物館對於館藏中原定為五代北宋越窯的一部份作品，重新審視，例如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和收藏浙江青瓷著名的牛津大學愛荷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就在近年將部分原定為越窯的作品，更改為龍泉窯作品（Rose Kerr, 2004; Shelagh Vainker, 1993）。但也有學者對於將這類作品皆歸為龍泉窯，持保留態度，例如《宋磁》展覽圖錄中，出光美術館藏五管瓶的說明文。
- 四：對於五管瓶的造型變遷，有幾位學者曾經論及。例如日本學者矢部良明在《宋代青瓷の展開》一文中，將五管瓶分為兩種形式，即本文前面提到的多層塔腹形及梅瓶腹形。依據其文章中的附表《宋代越州窯·龍泉窯青瓷編年試表》來看，似乎認為由梅瓶腹形的作品演變到多層塔腹形的作品（矢部良明，一九七八，頁一八一）。任世龍在談論龍泉青瓷的分期時，也曾談到五管瓶的演變，在其論述中，不僅提到器形由圓肩瘦腹到腹部多級分層，五管由立於器肩而逐漸緊貼腹部，裝飾也隨著器身之分層而分段刻劃花草或飾以帶葉脈紋的蓮瓣等演變過程（任世龍，一九八四，頁一一二）。兩者似乎都主張五管瓶由梅瓶腹形到多層塔腹形的演變，但是就本文上述的分期發展來看，這兩種形式並非直線發展，而是製作時代有所重疊。
- 五：簡介請見《蔡汝芬，一九九九》，類似的作品在四川遂寧南宋中期窖藏和韓國新安海底的元代沉船中也有發現。《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圖一八（二）及《新安海底文物》。
- 六：龜井明德著有《元豐二年銘青磁おもぐる諸問題》一文，發表於《大和文華》（龜井明德，一九九三）。浙江的陶瓷考古工作者，從當地的出土例也證實了這樣的論點（朱伯謙，一九九八，頁一一三），在同書圖五八的說明中還提到，在當地的墓葬中，常常是多管瓶、盤口壺和執壺一起出土（朱伯謙，一九九八，頁九七），前述茶豐墩頭村古墓出土的三件作品（參見圖四）就是一例。
- 七：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裡收藏一件與此多管瓶器形十分相似的作品，只是小嘴為多孔小圓球所取代（圖見Rose Kerr, 2004, p. 13）。
- 八：關於江西堆塑瓶的演變發展，主要可參考下列文章：楊后禮，《江西出土的堆塑長頸瓶研究》，《南方文物》，一九九一（一），頁八七—九五；富田哲雄，《宋・元の日月壺について》，《東洋陶磁》，vol.2021, 頁二五—一八六。
- 九：例如朱伯謙提及五管瓶可能與婺州窯的多角瓶用途一樣，皆為盛裝稻穀葬於墓中，作為墓主人的穀倉（朱伯謙，一九八九a，頁八）。
- 十：圖見朱伯謙主編，《龍泉窯青瓷》（台北，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圖五六和六一之一。
- 一一：例如《江西南昌朱姑橋元墓》，《考古》，一九六三—一〇，頁五七六、五七二；萬良田，《江西豐城縣出土宋代稻穀》，《農業考古》，一九六三—一〇，頁一一二。江西南昌博物館收藏的一對日月瓶，刻有「東倉」、「西庫」的字樣，見陳定榮，一九八六。
- 一二：雖然在宋代，蓮花之裝飾相當普遍，不見得一定與佛教有所關聯，但是在所見眾多的五管瓶上，很一致地以蓮花為裝飾，且幾乎不見其他裝飾主題，而且在當時浙江地區佛教相當興盛，因此這種作為民間葬俗的明器，可能也混融了佛教的因素。在夏威夷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收藏的一件相關類型的蓋瓶，腹上就貼飾有五葉片狀的佛像（Jan Wirgin, 1979, p. 37-d）。

晚期（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中）



A-5

A-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6

A-6
大和文華館藏
(1080年)
《青磁》, 插圖29



A-7

A-7
Barlow Collection
Michael Sullivan,
1963, pl.74b



A-8

A-8
慶元縣文物管理
委員會藏
《龍泉窯青瓷》,
圖62



A-9

A-9
龍泉博物館藏
《龍泉窯青瓷》,
圖56



B-5

B-5
龍泉地區出土
《世界陶磁全集》12,
插圖51

附表：青瓷五管瓶發展分期

		早期（十世紀末到十一世紀中）	中期（十一世紀中到十一世紀末）		
A 多層塔形腹	 <p>A-1</p>	 <p>A-2</p>	 <p>A-3</p>	 <p>A-4</p>	
	<p>A-1 《世界陶磁全集》 12，宋，圖44</p>	<p>A-2 龍泉博物館藏 (1070年) 《龍泉窯青瓷》，圖61</p>	<p>A-3 Barlow Collection Michael Sullivan, 1963, pl.74a</p>	<p>A-4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世界陶磁全集》12， 圖174</p>	
B 梅瓶形腹	 <p>B-1</p>	 <p>B-2</p>	 <p>B-3</p>	 <p>B-4</p>	
	<p>B-1 掬粹巧藝館藏 《世界陶磁全集》12， 圖172</p>	<p>B-2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世界陶磁全集》12， 圖173</p>	<p>B-3 龍泉博物館藏 《龍泉窯青瓷》， 圖36</p>	<p>B-4 龍泉縣三溪宋墓出土 《龍泉青瓷研究》，圖貳-2</p>	